

2014. 3

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会刊
中国外语类核心期刊

日语学习与研究

JOURNAL OF
JAPANESE LANGUAGE
STUDY AND RESEARCH

日语语言研究

- 1 社会文化语境下的日本和歌俳句隐喻含义解读
7 类型学视阈下的汉日语多项形容词定语语序对比研究
14 产物指向结果副词的考察

日语教学研究

- 59 对我国日语教育的课堂教学改革之探索
66 日语基础课堂教学中的音乐辅助教学

日本文学研究

- 81 轮回于矛盾中的求道者
87 佐藤春夫与中国古典闺秀诗
95 论古井由吉作品中山的象征意义



中国 北京

《日语学习与研究》编辑委员会

目录

(中国日语研究学会上海分会选题)

社 长：
施建羊

副 社 长：
胡福印

编委会主任：
徐一平 李爱文

编委会成员：
(以姓氏笔名为序)

于日平 于荣胜
马 骏 韦立新
王 勇 王志松
王健宜 刘利国
刘德有 曲 维
许宗华 李二敏
李庆祥 李运博
汪玉林 陈百海
邱 鸣 林少华
修 刚 姚莉萍
赵华敏 徐 冰
郭德玉 宿久高
彭广陆 谭晶华
潘寿君 戴宝玉

总 编 辑：
李爱文

副 总 编 辑：
姚莉萍
吴莫杰

责任编辑：
付 萌 刘雅静

特约审稿人：
于日平 于荣胜
张 威 邱根成
陈百海 宛金章
徐一平 秦 刚
翟东娜 谭晶华

英文校注：
Andrew MacNaughton

版面编辑：
李广悦

■ 日语语言研究

- 社会文化语境下的日本和歌俳句隐喻含义解读
——兼与汉诗对比 毛峰林 1
- 类型学视阈下的汉日语多项形容词定语语序对比研究 盛文忠 7
- 产物指向结果副词的考察 黄 晋 14
- 论表示目的的“テ形从句”及其定位 吴红哲 23
- 原型范畴理论与日语程度副词语义研究 吴伟丽 29
- 动词「つく」的语义扩展与认知机制
——以「～が～をつく」的结构为中心 李菁菁 36
- 话语礼貌理论视角下的日语拒绝行为研究 时晓阳 43
- 日语指示词研究的量化分析和分类新探 曾 婧 50

■ 日语教学研究

- 对我国日语教育的课堂教学改革之探索 彭 瑾 徐敏民 59
- 日语基础课堂教学中的音乐辅助教学 李 鹏 66
- 中国日语学习者的学习观调查
——以日本“社区日语学习班”的中国学习者对象 周 萍 73

■ 日本文学研究

- 轮回于矛盾中的求道者
——谷崎润一郎《鹤唳》论 钱晓波 81
- 佐藤春夫与中国古典闺秀诗
——以《车尘集》的编选为视点 齐 珮 87
- 论古井由吉作品中山的象征意义 高丽霞 95
- 潜藏的“孤独”
——坂口安吾《紫大纳言》之叙事张力分析 黄 芳 101
- 超越制度的“身体”
——论田村俊子的《枸杞子的诱惑》 李莲姬 107
- 中日相思诗歌比较研究 赵莹波 114
- 大江健三郎作品中的“残疾”主题 徐 旻 宋高远 122

■ 信息专栏

- 第一届“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九外杯)
《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优秀学术论文奖”获奖名单 121
-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封三
- 上海新世界外国语进修学院 封四

轮回于矛盾中的求道者 ——谷崎润一郎《鹤唳》论

东华大学 外语学院

钱晓波

[摘要] 虽然同为谷崎润一郎的“中国趣味”作品群中的小说,《鹤唳》的精神世界与艺术内涵显然与其他作品有着不同之处。小说的主人公星冈靖之助将中华古典文化作为艺术追求的理想之境,不惜抛妻弃女而“隐身”其间。这与谷崎润一郎自身的经历相照,有着极为相似的部分。小论从对《鹤唳》的作品结构、人物特性的解析入手,试揭示谷崎润一郎美学艺术的特点,同时剖析作家的精神特质。

[关键词] 谷崎润一郎 唯美主义 鹤唳 中国趣味

1 “中国趣味”作品群

谷崎润一郎于1918年(大正7年)10月到12月间,经由朝鲜,游历了北京、汉口、九江、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回到日本后,于第二年在各种文学刊物上陆续发表了《秦淮之夜》(1919年2月《中外》)、《西湖之月》(1919年6月《改造》)、《天鹅绒之梦》(1919年11-12月《大阪朝日新闻》)等一系列以中国,尤其以秀美旖旎的江南水乡为舞台的小说、散文以及游记。

汉学造诣颇高的谷崎润一郎在这些创作中融入较多汉文学的元素,带有浓郁的东方主义色彩,为其一贯的唯美文风增添了不少中国情趣和东方情调。继上述作品之后,谷崎又陆续创作了剧本《苏东坡》(1920年8月《改造》)、小说《鹤唳》(1921年7月《中央公论》),还整理发表了游记《庐山日记》(1921年9月《中央公论》)等。这些作品或以中国为舞台,或融入较多中国元素,形成了一个以“中国趣味”为主的作品群,是谷崎润一郎漫长的创作生涯中颇具特色的一个时期。

小说《鹤唳》的舞台背景虽未设定在中国,但主体结构中融入了众多的中国古典文化元素,同样属于“中国趣味”作品群。然而与前述的谷崎润

一郎在1919年(大正8年)创作发表的几篇小说相比较,其艺术内涵却发生了一些变化。

比如,《秦淮之夜》以纪实性的手法极为细腻地刻画了当时的烟花城——南京,尤其是秦淮河两岸充满感官诱惑的魅力。在这篇小说中谷崎润一郎详细地记述了秦淮河畔的地理位置,甚至将近似于迷宫的小街陋巷都记述得清清楚楚,以至于《秦淮之夜》看上去更像是一篇游记^①。《西湖之月》则是一篇以“佳人薄命”为主题的,典型的中国式传统小说。故事本身并无太多的冲突和曲折,但谷崎润一郎在其中有机地穿插了北宋隐逸诗人林逋、元末诗人杨维桢、明代诗人高启、清代剧作家李渔等的诗词歌赋。借用这些中国古代文学,使整篇作品充满了古典的东方情韵。《天鹅绒之梦》同样是以杭州西湖为舞台展开的小说,作者更是借用东方情调中特有的神秘与梦幻,创作出一幕超现实的奇幻故事。上述这些小说借用大量中国元素,直接突出了小说主题的古典性、神秘性和感官性,组合成绚烂多姿的东方古典美,是典型的具有“东方主义”表象的作品。

而《鹤唳》中的“中国趣味”,其在作品的主题意识中所发挥的作用显然不同于上述几篇作品。《鹤唳》中所阐述的“中国趣味”,更富有一种隐喻性,寓意作者自身构建的艺术理想的境外之境。

2 《鹤唳》的“中国趣味”

小说《鹤唳》的篇幅不长,描绘了一个痴狂于中国古典文化的日本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与艺术理想之间挣扎的故事。

小说以第一人称“我”为叙事者。三月某天午后“我”独自散步于寓所周围。偶遇一处建有中国式建筑的宅院,其中有身着中国服饰的少女在与仙鹤嬉戏。不禁好奇,多方打听,终于得知宅院主人名为星冈靖之助,生性内向阴郁,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妻子志津温良贤淑,育有一女照子。星冈曾抛妻弃女去中国游历,誓言永不回返。而六七年后却又带着中国妇人和仙鹤同归。之后星冈修建“锁澜阁”,与中国妇人同住。一日,女儿照子压抑不住心中怨愤,执短刀杀死了中国妇人。

如前所述,小说《鹤唳》的主题特征虽然不同于谷崎润一郎在这个时期所创作的其他“中国趣味”小说,但小说仍然具有“中国趣味”作品群的特征,即将中国的文化元素穿插于作品主体结构之中。

主人公星冈靖之助的祖父从医,同时喜好中国古典文学,擅长汉诗创作,并与“槐南、岐山”^[2]有过诗作的交流,留有自作的《梅崖诗稿》。星冈受祖父熏陶,对汉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憧憬之情。当星冈感到内心孤独疲累之时,便会躲到祖父所建的隐居之所“梅崖庄”,随手翻阅祖父收藏的诗词、戏曲、小说、野史等汉文典籍。星冈对于祖父遗留的《梅崖诗稿》也是珍爱非常。自己也时常做些汉诗,“以稍稍慰藉那种无法遣怀的寂寥心情”。

由此可见,阅读中国古典文学是星冈靖之助的兴趣所在,更是其排遣孤独寂寞的一种方式,慰藉疲累内心的一贴良药,当星冈暂时无法挣脱现实的束缚之时,“梅崖庄”则是其躲避喧嚣俗世的清静所在。

星冈靖之助年轻时便时常将“日本是如此令人厌倦,想要去到那遥远的外国”之类的话挂在嘴边。当母亲为让其尽早完婚而引来媒妁之言时,星冈更是表示“若是母亲不在了,立刻就到国外去”。可见其内心充满着“远游”的念头。成婚后,星冈阴郁的心暂时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一两年中算是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然而母亲的溘然离世,却又将其“囚禁在了青年时代的懊恼与寂寞之

中”。终于在某日,星冈向妻子表示“要去中国”,这并非旅行性质的远游,而是一种一去不复返的,意志坚定的出走。

对于这种念头,星冈的解释是“自己活在中国的文明与传统之中,也希望能在哪里终了一生。无论是自己还是祖父,正是间接地沐浴在中国思想的恩惠之中,才能够在这贫瘠的日本生活。自己的身体内里,祖先世代流淌着中国文明的血脉,而自身的寂寥与忧郁,也只有在中国,才能得到慰藉”^[3]。

星冈靖之助抛妻弃女,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日本,投奔自己心中的理想之地——中国,且一去音信杳无。这种意志决绝、义无反顾的出走,既表达了星冈对于中国文化如痴如狂的憧憬和崇拜之情,从星冈的自述来看,还伴随有一种追求生命的本源和性灵的原初,实现精神上自我超越的寓意。星冈的出走,不仅仅是对现实束缚的简单的逃离和挣脱,其中暗含着一种期待,期待“自身的寂寥与忧郁在中国得到慰藉”。星冈把中国作为有形世界的代表,来实现自身理想中心灵净界的追求。

星冈自述的“寂寥与忧郁”究竟来自于何处?小说未给出详细的解释。星冈生性阴郁,而人生似乎又充满了幽咽的怨情、无奈的感伤。那种无可名状的寂寥之感始终笼罩在星冈周围,使其或借助挥霍酒力来显示狂放,或躲在“梅崖庄”中神之远游。星冈感到日本的“贫瘠”。“贫瘠”的最终是导致生命之花的枯竭,由此而生的种种无可奈何的恍惚和怅惘,致使其向往投奔至境外之境,实现精神上的超越,探寻生命的永恒。

无可奈何的寂寞、自怨自怜的孤叹、深院幽闭的隐藏、杜鹃啼血的企盼、义无反顾地超越,星冈靖之助的精神世界似乎可以解构出中国美学的意境。谷崎润一郎在《鹤唳》中并未引用汉籍典故、美辞丽句,以突出东方的古典情韵,也没有创作绚烂华美、哀婉凄丽、奇幻化境的才子佳人式的故事。所展示的“中国趣味”远远没有前述的几篇作品来得直观和具象。《鹤唳》的“中国趣味”是意念的抒发和流动,更趋向于精神的写照和传递。由“形似”向“神似”,《鹤唳》的“中国趣味”脱离了单纯的模仿和直白的审美,从艺术精神的层面来看,似乎更有深度。

为了烘托作品的整体气氛以及表达主人公对中国文化狂热的追求之心,小说在细微之处也点缀有不少中国元素。比如,星冈靖之助的祖父所建的隐居之所“梅崖庄”,以及星冈从中国外游归来时竟然携仙鹤同归,都让人不禁联想起以“梅妻鹤子”著称的北宋诗人林逋。而对于具有中国传统建筑特色的“锁澜阁”以及中国服饰,谷崎润一郎更是发挥其擅长的工笔细描的表现手法,将这些都描绘得细致入微。

3 谷崎润一郎与星冈靖之助重叠的人生

作家的创作多取材于真实生活,尤其会将自身的家庭环境、人生经历、生活场景投射到作品中。在艺术创作上谷崎润一郎曾经明确反对所谓的“私小说”,但其作品中也常常会有自身生活的投影。比如小说《异端者的悲哀》便是典型的例子。而在《鹤唳》中,结合谷崎润一郎的人生经历与家庭生活来看,我们也不难发现主人公星冈靖之助与谷崎润一郎之间或多或少有着重叠的部分。

星冈靖之助父亲早逝,祖父、母亲对其宠爱非常,使其性格中有着极为任性的部分。祖父离世后,和母亲两人寂寥的生活,又使其性格变得阴郁,对人生持消极的态度。从东京的帝国大学国文科毕业后,不思就业,经常连续几日离家去东京游玩挥霍,偶尔回到寓所则躲在祖父所建的“梅崖庄”中沉溺于古汉文学的阅读中。这样日复一日地持续着百无聊赖、自由闲散的生活。对于母亲催促其尽早完婚的要求,星冈也是置若罔闻。终于在二十七岁时不知何故,突然听从母命迎娶妻子志津(しづ)。婚后的一两年间,安稳的家庭生活总算使星冈有了一些转变,在当地的一所中学教授汉文,并育有一女照子。然而,不久之后母亲的离世,却又将星冈的性格“囚禁在了青年时代的懊恼与寂寞之中”。

从谷崎润一郎的回忆自述《幼少时代》可以看出,在其成长过程中祖父与母亲所给予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些影响甚至直接导致谷崎润一郎形成了“西洋崇拜”、“女性崇拜”的文学风格和创作思路。谷崎润一郎年轻时忧郁且不羁的性格以及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国文科后放浪的生活状态,也和星冈的性格和生活有类似的部分。而这之后的

婚姻与家庭更是和星冈的经历如出一辙。谷崎润一郎在三十岁时与石川千代完婚。婚后长女鲇子出生。三十二岁时,谷崎润一郎的母亲溘然离世。三十三岁时谷崎润一郎终于跨出家庭与国门,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远游。

再看谷崎润一郎对星冈妻子志津的描写。志津是个“人品高雅,接受旧式士族家庭传统教育,如同清澈见底的湖水般,娴静的,又稍带寂寞之感的,内向的”女子。婚后的志津对丈夫谦恭有礼,温顺体贴。眼见丈夫终日情绪低落,闷闷不乐,或索性整日躲入“梅崖庄”中,志津也只是默默忍受,并没有太多的埋怨和责怪。“任性得如同病人般的丈夫越是疏远她,她越是温顺体贴”。志津满怀期待。期待有一天丈夫能够明白她的心思。然而,星冈最终还是没能像志津期待的那样,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即便如此,志津仍然保持着温良贤德的本性,带着只有五六岁的照子过着简单的生活。一日三餐不忘给丈夫供奉“阴膳”^[4],也从不怠慢祖父和婆婆的法事,一如既往地度过了六七年的时间。当誓言“此生永不再见”的丈夫突然带着中国妇人和仙鹤归来之时,志津喜含泪水欣然接受丈夫的回归。而当志津最终明白丈夫是身归心未归时,却仍是默默地接受了这个事实,继续着她的忍耐。

谷崎润一郎在《鹤唳》中塑造的这样一个恪守传统、忍辱负重、始终默默接受命运安排的“贤妻”形象,让人不得不起谷崎润一郎的第一任妻子石川千代。

谷崎润一郎于1915年(大正4年)三十岁之时成婚。妻子石川千代是一个“柔顺、贞淑,体贴丈夫”^[5]的传统妇女。第二年,谷崎和千代之间有了一个女儿——鲇子。这种安定且美满的婚姻生活是大多数人所冀求的,而对于谷崎润一郎,这样的家庭生活却反倒让其感到一种羁绊与不安。谷崎在之后所做的回忆文章《为父》(『父となりて』)中这样述怀道:

对于我来讲,第一是艺术,第二才是生活。最初我努力想将生活与艺术合为一体,或者使生活隶属于艺术。(略)当觉察到自己的生活与艺术之间有着难以忽略的反差时,我试图为了

艺术而使生活至少能成为一种有意义的消费。我希望生活的大部分内容是为了完成我的艺术而存在的。对于婚姻也是如此,我曾想这样解释,婚姻是为了让我的艺术更良好、更深刻地发挥而存在的一种手段。正因如此,至今我仍然先艺术而后生活。这两者之间的轻重之别,使我曾经把它们完全分开考虑。我心向艺术之时,憧憬那恶魔之美。我眼望生活之时,惶恐于正道的警钟。我这个软弱而又专横之人,难以继续纠结于这两种心灵的争斗,因而至今时常堕入歧途。

由这段内心独白所见,谷崎润一郎在生活、婚姻、家庭与艺术创作的问题上,追求的是“先艺术后生活”,试图达到“艺术至上”的境界,加之其自身是个“理想主义者”,且对于理想的渴求又较一般人强烈得多。发妻的温柔娴淑,家庭的美满幸福,世间一般人所冀求的完美生活在谷崎润一郎看来似乎并无魅力可言。家庭的温馨和睦对于其内心所追求的艺术理想,也并不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反而成为一种令其惶惑的羁绊。由现实生活与艺术理想而产生的深刻矛盾,时不时地刺激着谷崎润一郎任性而又敏感的神经,生出无可名状的忧郁、寂寞和恐惧之情。然而本性的“软弱”却又使得其难以彻底地去寻求最终的出口,能做到的只是始终徘徊和轮回在这种复杂而又无可调和的矛盾之中。

理想欲求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断层而引发内心的波动与挣扎,这样的心理活动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曾经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遭遇这样的矛盾,或妥协、或抗争、或逃避、或陷于其中郁郁寡欢。谷崎润一郎为《鹤唳》中的星冈靖之助设计了离家出走,远游中国,这不失为矛盾迂回的一种方式。而现实生活中,谷崎润一郎自身同样也是用这种方式来暂时回避矛盾,整理心境的。

谷崎润一郎自小熟读中国古典文学,自然而然地对中华文化怀有强烈的憧憬之情。1918年10月到12月间的中国之行极大地满足了其对中国文化的渴求。而从谷崎润一郎自身的家庭生活来看,此次中国之行亦是为了逃避由家庭矛盾而生出的种种烦恼(尤其是感情问题),试图通过这样一次外游调整烦乱心绪而做的“散心之旅”。这次

远游的经历与星冈靖之助的出走显然也有重叠的部分,只是在小说中,谷崎润一郎将远游延长至了六七年的时间。

谷崎润一郎结束中国之行回到日本后,于次年12月间将家从东京搬到了神奈川县小田原町。此次搬家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女儿鲇子的身体,海岸边温暖湿润的气候可能更利于鲇子养病。《鹤唳》的前半部分,“我”于三月的某日午后在寓所周围漫步闲游的场景描写,可能就取景于小田原附近^①。

《鹤唳》发表于1921年(大正10年)7月。同年3月,谷崎润一郎与另一位日本著名作家佐藤春夫之间,因妻子千代夫人而绝交(即日本文学史称“小田原事件”)。这之间又发生了许多曲折折的故事,因篇幅关系不再赘述。一直到1930年(昭和5年),谷崎润一郎与石川千代正式离婚。

4 轮回于矛盾中的求道者

读罢《鹤唳》,我们不难发现,这篇小说整篇贯穿着一个关键词,即“隐”。

星冈靖之助在婚前,经常在寂寞无聊之时躲入“梅崖庄”中翻看祖父留下的各种汉文典籍。婚后,更是“好像厌恶家庭气氛似的,偷偷地溜进‘梅崖庄’,昼夜不出”。如果说这种躲避和隐藏还只能给星冈带来暂时的安宁和慰藉的话,之后的出走中国,则是其寻求“永久”心灵安逸的“隐”。对于这种“隐”,星冈是做了充分准备的,在合理地安排了妻女的生活后,表示“此生永不相见”,从此音信杳无。当星冈最终因为“无法割舍对日本的眷恋”又回到家中后,推倒“梅崖庄”,修建“锁澜阁”,将自己和中国妇人“隐”入其中。同时,着中国服装,讲中国话,并表示“一生不讲日语”。在形神上都彻彻底底地“隐”入到了自身构筑的“理想”空间。

除了星冈靖之助的“隐”,小说中星冈祖父的生活中也有“隐”的部分。“梅崖庄”便是祖父所盖隐居的草庵。作为小说叙事者的“我”的生活,也含有“隐”的部分。比如,小说开头,“(我)整个冬日始终幽闭于书斋之中,几乎不怎么外出”等等。只是这些“隐”并未完全地脱离现实,这种“形隐”与星冈靖之助的“隐”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了。

隐逸思想,是不与浊世谋求调和的隔离;是执

着追寻自我理想的孤高；是舍身探求生命本源的超越。隐逸者，或是因谏言而被贬，怀才而不遇，隐遁于山水以示不群；或是崇尚自然之美，追求纯真之态，狂放于天地以求自适。隐逸的形态或许多种多样，隐逸者都属于灵魂上的洁癖者，为探寻性灵的独立、精神的永恒，孤独求道而乐此不疲。

星冈靖之助从隐藏于“梅崖庄”的小世界，到离开“日本”投奔“中国”的大天地，都是置个体于现实之外，追求的都是一种心灵孤独和灵魂自适的情调。

然而，毕竟人性中有着与生俱来难以克服的弱点。无论是小隐或大隐、朝隐或市隐，通过隐逸来实现理想中的自我超越，求道乃至悟道，首先必须克服这些弱点。由此而生出的各式各样的“自我矛盾”不断地困扰着求道者们。而当求道者在消化和处理这些“自我矛盾”的时候，又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附带出人性中既善且恶的“两面性”。

谷崎润一郎很显然也时常困顿于这种“自我矛盾”和“两面性”中。前文引述的《为父》中，谷崎在处理婚姻家庭与艺术理想的关系中便深深地陷入了这样的矛盾。我们在观察谷崎润一郎的文学生涯以及作品的特质中也能或多或少地看到类似的矛盾和“两面性”。

同样，在《鹤唳》中谷崎润一郎也为星冈靖之助设定了多重的“自我矛盾”和性格上的“两面性”。

星冈靖之助不止一次地感叹“日本是如此的令人厌倦”。这里的“日本”可以理解为泛指其所生活的现实之境。现实是如此的令人困顿和厌倦，因而希望可以逃遁到一个境外之境。星冈抛妻弃女，毅然决然远走中国时的态度是何等的坚决，那种“此生永不相见”以及之后六七年间的“杳无音信”，无疑是传统道德所要批驳的“恶行”。然而在星冈下定决心之后，其又担忧妻女日后的生活，将家产悉数给予志津，并主动要与其离婚的念头，似乎又是一种体恤守义的“善举”。失踪了六七年之后，“因无法割舍对日本的眷恋”，星冈出人意料，或者说意料之中的回归，既可以解释为“回头是岸”，又可以看成是“机会主义”者的行为，同时也揭示出了一种尖锐的“自我矛盾”。回到妻女身边，本该安分守己，尽享天伦的星冈，却带回了在中国相依相伴五年的中国妇人，并向志津苦苦

诉说恳求其接纳。利用志津的善良贤淑，这似乎又是星冈道德上的“恶”。已经回到现实生活中的星冈，从中国运来木材和砖瓦，大兴土木，修建“锁澜阁”，将自己隐身于“小理想乡”。又一次突出和展现了其内心不可调和的矛盾所在。

星冈对于妻子的态度也显示出一种明显的“自我矛盾”。妻子志津是一个极具传统美德的旧式妇女。但那种普世道德式的温良贤德却无法满足星冈的冀求。同时，从星冈的言行中也不难看出其对于志津也充满了歉疚之情。这种情感的纠结，善恶的挣扎，直接映射出谷崎润一郎在处理与石川千代的关系，以及自身情感上的极为矛盾、复杂的心路历程。

小说所描写的星冈靖之助行为的矛盾和心理的纠结，有艺术夸张的部分。而由此反映出其性格上的“两面性”甚至于“多面性”，却是人性的真实写照。人性中善恶并存，真伪同体，虚实兼并，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局面可以映射出人性复杂而难解的部分。如此这般星冈靖之助（≡谷崎润一郎）就这样在一重又一重的“自我矛盾”中苦苦挣扎，轮回反复，虽然星冈最终并未能走出困境，实现精神上的自我超越。

《鹤唳》发表于1921年，谷崎润一郎36岁的时候。这是一个由青年期逐渐步入中年期的年龄段，人在接受价值观的冲击，或自身内涵建设会不断地产生各种程度的变化，这种变化较之青年期的单纯与直白更具杀伤力和深刻性。而由这种变化激发出的自我肯定与否定、克制与放纵、善恶真伪的取舍等意识矛盾不间断地相互挤压、碰撞，无时无刻不在困扰和刺激我们的神经，诱发我们的思考和探索。人正是通过对于这类矛盾的认知和剖析来达到自论内省，并逐步实现自我救赎和超越的。

吉田精一在分析谷崎润一郎的性格与文学的关系时曾指出，“对于自我的存在与趣味（谷崎润一郎）是个热情的探索者，然而其并没有太大兴趣去探寻他者人生的根本存在条件，同时也缺乏一种将自我转为客我的强烈愿望。因此，谷崎润一郎的人性观相对狭隘一些”^[7]。确实，我们从星冈靖之助这个人物的塑造，或者说谷崎润一郎借助星冈靖之助来进行的自我剖析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吉田精一阐述的精确性。

从高调宣扬自我而无视他者的存在，以及客我缺失等角度来看，谷崎润一郎是个不折不扣的

“异端者”，但我们很难用某种既定的价值观简单地为其做善恶真伪之分的判别。两面乃至多面的性格特征构筑起来的人性才更富有立体感。同时，或许正是在思想和精神上的“异端”，促使谷崎润一郎在艺术追求上能够始终如一地坚持己见，保持完整性和独立性。

5 结 语

特立独行者往往是思想和精神上的寂寞之

人。正如同谷崎润一郎自述“知我心者，唯己一人”，艺术追求是一段孤独的旅程，而生命本身又或许是一种寂寥的等待。那种“花落而泣，云起而欢”的妙境往往唯有自赏之。

本稿结尾处，笔者不禁想起谷崎润一郎在京都法然院的墓地。简素的墓地上无任何碑题墓志，唯有两方各刻有谷崎润一郎手书之“寂”“空”二字的自然石。谷崎润一郎永眠于“寂”字石下。似乎在告知我们，毋需多言，只一“寂”字足以概括前世今生。

注

- [1] 橋本芳一郎. 近代の文学 8 谷崎潤一郎の文学[M]. 桜楓社, 1965. 在作品年表中, 将《秦淮之夜》归为游记: 260.
- [2] 槐南, 即森槐南; 岐山, 即木苏岐山。两者均是明治时期日本著名的汉诗人。
- [3] 本稿中的引用翻译均为笔者译。以下同。
- [4] 为旅行或出征者供奉的饭食, 以祈求平安。
- [5] 野村尚吾. 伝記 谷崎潤一郎[M]. 六興出版, 1972: 199.
- [6] 野村尚吾. 伝記 谷崎潤一郎[M]. 六興出版, 1972: 232.
- [7] 吉田精一. 近代文学鑑賞講座 9 谷崎潤一郎[M]. 1959: 16.

参考文献

- 钱晓波. 谷崎文学に於ける“支那趣味”について—大正八年前後を中心に. 杏林大学国際交流研究所 研究年報[J]. 2002, (5).
- 朱良志. 中国美学十五讲[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神楽岡昌俊. 隠逸の思想[M]. ベリかん社, 2000.
- 井波律子. 中国の隠者[M]. 文芸春秋, 2001.
- 钱晓波. 知我心者 唯己一人——祭扫谷崎润一郎之墓. 日语知识[J]. 2001, (12).

作者简介: 钱晓波(1972—) 男 汉族 东华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 研究方向: 日本文学研究
联系方式: E-mail: xiaobo@dhu.edu.cn

Truth Seeker in a Cycle of Contradictions

— on Junichiro Tanizaki's *Kakurei*

Abstract: Although it belongs to the same group of “Chinese interest” works by Junichiro Tanizaki, *Kakurei* has an obviously different spiritual world and artistic connotation from the other works. Yasunosuke Hoshioka, the main character in the novel, pursues Chinese classic culture as his own artistic ideal to such an extent that he discards his family and immerses himself in it. This experience is quite similar to the writer Junichiro Tanizaki himself. This paper tries to disclos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unichiro Tanizaki's artistic pursuit and analyze his spiritual essence by decompos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novel *Kakurei* and the features of the characters.

Keywords: Junichiro Tanizaki; aestheticism; *Kakurei*; Chinese interest

Author's Information:

Qian Xiaobo (Male) Year of Birth: 1972 Associate Professor at Donghua University
Japanese Literature Study E-mail: xiaobo@dhu.edu.cn